

# 寻找张国焘墓地

○ 桑宜川

2010年盛夏,我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往多伦多,去参加母校北美校友会的年度聚会。其间,在两位学友的陪伴下,专程去寻找了张国焘的墓葬之地。多伦多市区周边的墓地很多,然而关于张国焘的下葬墓穴,坊间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语焉不详。为了能顺利寻找到真实的墓地,出发前我们做了仔细的调研,查询了张国焘墓地的大致方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驱车出发了。

张国焘,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领袖,遭遇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批判,对于加拿大的张国焘葬身之地,据说过去许多老华侨也唯恐避之不及,几乎没人敢去看它。

## 张国焘的死因刍议

据现今可查阅的资料,张国焘是1979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时值冰天雪地,天气奇寒。那天晚上养老院突然停电,没有了暖气,当时他已是中风的孤独老人,夜里毛毯从身上滑下来,他行动不便,被活活冻死了,死后就葬在这座松山墓园里。这是目前海内外最为流行的坊间故事,起源于张家友人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真伪难辨,描述了与张公夫人杨子烈的越洋电话内容,时值张公去世的第二天。此后,可见的文字还有国内记者来加采访,回国后报道的情节如出一辙。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老人与妇

女儿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的《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入行专业人士,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国焘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旗袍加身,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

张国焘去世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所谓张国焘最后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一旦有人被冻死,多伦多的这家老人院将引发新闻,面临倒闭,并且承担巨额赔偿与法律问责。

## 我看你来了

我们驱车径直来到了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位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这才知道张国焘墓可能就坐落在这里。我带着种种好奇与疑问,首先造访了墓园管理处,希望能寻找到些许线索或可能的答案。

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筑,类似于时下的一幢豪华别墅,大厅里明窗净几,淡蓝色的地毯,雅致的鲜花与绿色植物,营造出了一种五星级酒店的氛围。此时,柜台后面几位职员正忙碌着,见到我们的到来,便热情地招呼着。应客人的请求,按照办事程序,一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开始了各种方式的检索,不厌其烦,但是结果却不容乐观,始终也无法查询到有关张国焘的中文

样,或近似的英文拼音字母。

据该职员回忆,近年来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这位张国焘先生的下葬情况,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姓名和任何相关记录。由此可见,大多数来访者因查不到张国焘的姓名,无果而返。

正当我们感到彻底失望之时,那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 Kai-Yin Cheung 的先生,说是相似中国姓氏,向我们求证。我一听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因为我知道,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法,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正如仲甫即是陈独秀,润之即是毛泽东,博古即是秦邦宪,只是博古的字号在中国现代史中更为出彩,如雷贯耳,几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实姓名。

博古最辉煌的人生是在张国焘之后,他在24岁时就做了中共的总书记,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至今远在无锡,他的家乡人为他而骄傲,为他立碑,修缮故居,献花拜舘,年年如此。家乡人从不忌讳博古或曾犯过所谓错误,更欣赏他自省反思的博大胸怀。是啊,凡人都有做人做事走偏了路的时候,何以因言因事毁人一生?目前,我们还可读到1945年中共七大发言记录文献,其中记载了博古的检讨:“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种大包大揽、保护他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他的家乡人称为仁义敦厚的楷模,传为佳话,永泽后世。

话说回来,我们确认了张国焘的墓穴在此无疑,就按照管理处提供的指南前往寻找。松山墓园很大,占地约有3000多亩,埋葬着数万魂灵,估计是多伦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几个墓区,主要以华人碑林为主,放眼望去,满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于中国墓园。我不由得惊叹,悠悠岁月,竟有这么多华人一生飘零,望洋兴叹,埋骨异乡,终究也未能落叶归根。

在墓园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区的三角地带,在偌大的一块坡地,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路小跑步,来来回回地奔走,仔细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队矗立在那里的碑林,看过了每一块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发现,好生纳闷,心想该不是墓园



松山墓园里的张国焘墓碑

管理处的职员指错了方向?

## 与墓园守望者的对话

因此,我带着疑问再次返回墓园管理处,希望那里的员工能帮我确认地理坐标,以便及时找到张公墓碑。或许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然,职员们显出一脸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何以要如此执著地寻找一位非亲非故的亡者。

无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园管理处的员工帮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是他们却表示不能接受,也绝不陪同,言之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是在管理处主事接待,从不陪同客人下墓区。这或许可理解为忠于职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讨个风水吉利,中西文化的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是日,已是夕阳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在墓园里逗留了已近三个小时,奔走得精疲力竭。两位学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不想再继续寻找下去了。我告诉两位学友,这次我万里走单骑,专程来多伦多一趟颇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后梳理一圈,即使无果而返,也就无怨无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间,我猛一回头,瞥见了不远处,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张国焘”的四个苍劲的魏体汉字,啊!终于找到了!

## 隐姓埋名为哪般

近年来,鲜有见诸于报端,描述张国焘墓碑的文字和图片,仅有的几段文字多以竖立墓碑为



张国焘夫妇合葬墓

张国焘唯一的墓碑，其实大谬。这块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理。由此也可见入乡随俗的影响之深，显然仅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他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 DEC.9.1902—MAR27.1994。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 1994 年 3 月 27 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 1979 年 12 月 3 日整整 15 年。那么，张国焘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究竟在哪里？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以张国焘的身份，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经过仔细实地考证，我终于发现了谜团的答案。

显而易见，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七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褐色，全英文，上书字母 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师，而非 15 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

可以想象，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国焘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时自然由牧师主理并立碑文，顺理合情，同

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与情仇骚扰，从此隐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里，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与牧师给力的精心设计与高明之举。

离开墓园之前，我再次“三顾茅庐”，去到了墓园管理处，向几位员工求证，为何一碑两用？为何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与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过去年代里本是同样正面位置，现在却变成了西人 Black（布莱克）夫妇？西人夫妇的碑文立于 2000 年 2 月，完全是新刻。根据时间顺序推理，晚于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六年，显然是采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后者的碑文。

在中国墓葬文化里，一碑两用，这一作为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极少有亡者后人采用。最为叫绝的是，墓园管理人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扫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难会想到这块竖碑还另有玄机，背面还刻有中文方块字？难怪来访的晋谒者按图索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北，看到的只是西人夫妇合葬的英文碑文。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并且完全没有按编号排列，显得有些散乱无序，看得出当年下葬还没有纳入统一管理，逝者后人选址的随意性颇大。因此，可以推论，张国焘的原始地碑及冥坟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起，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保存完好。人们只知有竖碑存在，殊不知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重大历史误读。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实冥坟，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灵，而非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杨子烈去世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迄今为止，对这一被忽略的

重要细节,还没有看到过海内外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报道。

## 走为上计

据现今可查阅的文献,早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出身豪门望族的学生领袖张国焘便在北大教授陈独秀的介绍下,与图书馆员工毛泽东握过手。多年后,毛还曾为此感叹“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同会,张国焘被选为大会主席。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今四川小金县的懋功会师,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重大政治斗争。张深谙毛的作为,既是同党同志,又是棋逢对手,最后必有一场输赢。

遥想当年,张国焘有过关乎一生荣辱生死的两次出逃。

第一次是告别延安。他领导的红军主力在西进途中几乎全军覆没,侥幸逃生的部分红军将领,又相继被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污指为“托派”,遭到清算,所剩不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写道:“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由此可见,张国焘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8年,张国焘借道去西安祭黄帝陵大典之机,告别延安,投奔设在汉口的民国政府,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共赴国难,抗日救亡”,真实的原因是王明给他带来死亡恐惧感。党史文献记录着: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第一领袖自居。张国焘曾多次挨过王明的整肃,对他表示冷淡,然而仍躲不过王明对他的刁难。当王明约张国焘单独谈话时,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这里指的李特曾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曾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王明这次大开杀戒,死在他的刀下的冤魂还有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三位红军高级将领,共计五人。他们皆为当年张国焘留学莫斯科列宁学院的同届同学,风华正茂的红军精英。

张国焘听到他最信任的红军将领们竟被处

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谴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当时的延安,已在酝酿筹备公审张国焘等人的党内斗争大会。

张国焘的这最后一次与王明之间的延安对话,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多舛,由于自己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2000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因果相报,大祸也即将临头,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只有最后下决心出逃,走为上计。他在《我的回忆》里说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

但他这一走,导致他的众多红军部下受到极大的牵累,株连甚广,确实非英雄所为。倘若张国焘不逃离当时的困境,而是忍辱负重,虚心认错,留在延安,以及1949年后的北京,不知是否还能逃得过后来历次党内斗争的整肃?是否还能逃得过“文革”浩劫?

## 避乱于天涯海角

第二次是告别香港,远走天涯海角。1949年以后张国焘为避灾祸,从国内举家逃难到了香港,从此息影香江,住了整整16年,没想到在1966年世事又发生了沧桑巨变。当时,“文革”浪潮已波及香港,追杀张国焘的红卫兵大字报已贴满了中环、旺角一带的市区街道,遂引得这块飞地也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知道明晨天亮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张国焘感到香港已非安全之地,呆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决然出走,举家飞往加拿大。

从个人结局看来,张国焘是不幸之中的万幸,避乱于海外,最终寻找到了他栖身之地,身后也有一块宁静的土地。当年八宝山公墓及全国各地,被掘坟的红色先烈何止成百上千?让世人都看呆了。■

(作者为加拿大华裔学者)

(责任编辑 黄 钟)